

近期民营企业“自查”式反腐行动受到关注，与国企反腐相比，民企反腐显现另类风格

民企反腐，远非“自家事”那么简单

焦点

■本报记者 王群

一种微妙的氛围开始在民企系统蔓延开来，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对腐败的容忍度正在降低。

随之而来的是，已在国企系统持续多时的“反腐之火”最终“延烧”到民企系统，也让更多民企开始审视自身的反腐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万达、腾讯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今年已至少24人被查处。

从曾经的家丑不愿外扬到如今的“自曝家丑”，显然，大量的民营企业正在提速脱离反腐“盲区”。

然而，它们的反腐路却走得并不寻常。

不会是“一阵风”而将趋于常态

谈及最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反腐案件，在腾讯公司工作的何先生明显感受到近来公司反腐力度的变化。

“以前公司发现类似贪腐事件往往只是内部做处理，不会随便对外公布，但现在会采取公开处理的方式，力度也在持续增强。”何先生告诉记者，腾讯此前已经出台了若干规章制度，形成了公司员工人皆知的“腾讯高压线”，同时由反舞弊团队实施内部调查，一旦有人触及高压线，轻则解除涉事者的劳动关系，如若涉嫌违法将移送司法机关。

在何先生看来，这类“高压线”的设立更多的是针对公司高管。“高管手中权限更大，寻租空间也更大，更容易滥用职权牟取私利。”

据媒体报道，腾讯曾在今年7月9日对外通报了严重违规事件，多名在线视频相关业务员工存在贪污受贿行为。

除此之外，其他的大型民企也纷纷展开各具特色的反腐工作。

7月14日，万达官网发布的贪腐通报显示，包括西安项目公司原工程副总在内的18人的贪腐行为被公开，同时出台问责处罚制度，实施“买单式”问责。



360公司则以内部邮件形式向员工通报了两起内部腐败案，公司内部的“监察部”主要负责对公司内部贪腐案件的查处。

记者梳理若干大型民企的反贪腐案例发现，民企反腐一般带有鲜明的公司特色，并且会体现企业领导者的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他们大都会专门成立反腐部门，依靠企业内部某个内设机构惩治腐败行为。

可以预见，民企规模越来越大，仅从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未来民企反腐将不会是“一阵风”而将趋于常态。

公司上市之后还代表公众的利益

“中国大陆接近五分之四的经济犯罪是由公司内部员工所为，采购舞弊是最常见的经济犯罪之一，它通常会发生在供应商筛选、

签约以及竞标等阶段。”这是全球会计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在2014年发布的“全球经济犯罪调查”中呈现的相关结论。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界习惯将目光聚焦在国企的反腐层面，对于民企领域的腐败现象往往反应平淡。一种普遍的观点即“那是企业老板的自家事，与外界无关，即便有腐不反也说得过去”。从某种程度上看，民营企业近乎反腐盲区。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私有财产权与国有、集体财产权是平等的，应该享有平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保护环境。

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可谓其长远发展的绊脚石，这不仅会导致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会损害企业外部的品牌信誉，同时还会干扰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他强调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民企反腐并非民企老板的“自家事”，还关系到他方的利益。“尤其是公司上市之后，便具有了社会企业的身份，还代表了公众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民企反腐更多的是聚焦于“企业内部的腐败”，即职工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企业财产，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形式：“作为企业家的腐败”。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看来，国企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以及“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寻租行为，通过定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以损害国家利益、侵占国有资产的方式为自己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

但在民企，由于产权结构较为清晰，不存在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民企的老板对自己的财产看得最紧，不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

因此，民企常常出现的腐败行为是其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即民企老板为牟取非法利益，向政府官员行贿。“如果说民企也要反腐的话，那么就应当严厉打击民企的各种商业

贿赂行为。否则，民营企业的反腐就仅仅是噱头。”程啸告诉记者。

下位法亟待完善

2014年，轰动全球的医药行业行贿案——葛兰素史克案曾将打击商业贿赂推向高潮。涉事厂家葛兰素史克利用贿赂手段谋求不正当的竞争环境，导致药品行业价格不断上涨，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最终被开出了高达30亿元的“巨额罚单”，多名高官获刑。

这一案件在产生轰动效应的同时，也对国内的企业反腐尤其是民企反腐产生了一定的警示意义。

事实上，民企腐败不仅是世界级的经济舞弊现象，更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当前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民企内部的商业贿赂犯罪形势不容乐观。

有关专家认为，企业内部经济犯罪类型包括采购舞弊和内部员工舞弊，此类事件的高发表明我们需要继续贯彻和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组织透明度，并且确保能够监督供应商和员工关系。

保育钧认为，在国家法律层面，民企反腐的相关立法还处于滞后状态，应该加速完善。“宪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上位法已经明确，下位法却还不完善，一旦腐败问题产生，民营企业也就面临不平等的法律保护环境。”

在程啸看来，目前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随着我国企业全面走向世界，今后无论在境内还是在境外，都应该全面规范商业贿赂行为。同时，可以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先进经验，如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

有专家建言，民企腐败，要与国家的反腐机制形成联动，增强自身反腐内在动力并主动出击，也要从构建新型反腐体系、强化民企与司法类部门间的合作等来筑牢反腐的篱笆。

导读



6版：民用无人机火爆背后的冷思考



7版：短租房：一个正被互联网搅动的行业



8版：排查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在行动

热点

■新华社记者 李鹏

“撵”字经念不动，“罚”字诀不管用。多年来，城管与小贩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零和博弈，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现“越治越堵”的怪圈。

谁都管不好，为啥不让摊贩自己管？1年前，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办事处开始在辖内推行“摊贩自治”试验。此后，城市街头风向为之一变，曾经违法占道的小摊小贩变身“文明商户”。街道的探索，或可为解开当前城市管理之困提供借鉴。

难题：谁都管不好，为啥不让商贩自己管？

丈夫患有腿疾，家里还有两个读书娃的李国琴，是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办事处辖区的一名摊贩。回想起过去的“流窜”，她总是心有余悸。“一大早就出门，上班就收摊，被撵来撵去，一个月只能挣干把块，连生活都顾不住。”

另一名小贩邢小路今年32岁，为了照顾患病母亲兼顾生计，年纪轻轻就到街头摆摊。“没钱买电三轮，只能买个脚踏的，城管来了跑得慢，不到半年人和车都被带走了。”

小贩们没少吃苦头，城管的工作也不好干。一年多前，建设路办事处城管科科长毛全虎每天的主要工作还是带着7、8名城管员满大街“撵人”。“以前辖区流动着三四十个摊贩，8个城管员撵都撵不过来，执法矛盾冲突是家常便饭。毛全虎在一次执法中被摊贩围攻，棉衣都被撕出了好几个窟窿，‘这样执法，我们也困惑。’

如今，建设路办事处辖区内的城管和摊贩之间的“零和博弈”不复存在。李国琴每个月能挣三四千元，提起辖区的城管人员满是感激，“街道办的城管没少下功夫，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城管和摊贩从势如水火到相安无事，建设路办事处的街头治理，源自一项“摊贩自治”的改革试验。试验的发起者之一，办事处副书记赵爽说，早在2007年，郑州市就出台规定，决定在全市设立临时便民疏导点，以“疏”治理摊贩违法占道经营的顽疾。

此后，街头的小商小贩按照规定被陆续集中到100多个便民疏导点，建设路办事处也“跟风”建起了第一个疏导点。尽管违法占道有改善，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最主要还是疏导点的管理问题”，赵爽说，当初为了将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办事处将疏导点设在了一个社区内，但办事处、小区业主、物业的管理关系总也理不顺，“都是有无利不起早，谁也管不好”。

最终，管理跟不上，流动摊贩又陆续返回街头。

面对故态复萌的“顽疾”，有了第一个疏导点的经验教训，经过慎重的调研后，办事处拍板，决定试验“摊贩自治”，既然谁都管不好，为啥不让摊贩自己管？

试验：小贩和城管不再“猫捉老鼠”

2013年底，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常住4万多人的建设路办事处，为了彻底根治街头违法占道、道路拥堵，将辖内流动摊贩全部集中到两个疏导点，开始推行“摊贩自治”。

在毛全虎看来，“摊贩自治”，是城市街道管理者和流动摊贩面对顽疾，渴望“求变”的结果。

但困难仍然始料未及，因为怕得罪人，摊贩队伍里连组长、副组长都选不出；管理必然有费用，费用标准怎么定也矛盾重重。办事处只好找到摊贩做工作，劝说有威望的人主动竞选组长，帮助制定商户公约，召集摊贩开会协商缴费标准……

2014年，在办事处的劝说下，本不情愿的邢小路通过投票当上了市场街疏导点摊贩自治的副组长。他说，摊贩之间有竞争，难免有矛盾，开始以为会得罪人，但一年下来，情

一个“摊贩自治”的街道试验样本

“谁都管不好，为啥不让摊贩自己管？”

况却是大家都十分珍惜合法经营的机会，“管理协调起来也没那么麻烦”。

记者走访看到，在建设路办事处的市场街疏导点，统一制式的25辆免费流动摊贩车和几个垃圾桶一字排开，路边立着摊贩商户自治的“六联一公约”，流动车的背后就是摊贩自治的信息公示栏。过往食客熙熙攘攘，但都在限定区域，摊贩与行人车辆互不干扰，道路干净整洁。

推广：街道个例能否普及？

“摊贩自治”后，建设路办事处辖内的摊贩“流窜”少了，道路状况、市容市貌明显改善，办事处城管科的工作人员减少一半，腾出的人手也被充实到了更基层的社区内，加强了基层管理的力量。

但问题也不是没有，比如毛全虎依然得上街“撵人”。“辖内的流动摊贩管好了，但其他区的摊贩一被撵，还是会跑到我们这儿”。毛全虎说，好不容易搞起的“摊贩自治”，会受到“外来威胁”。

尽管“摊贩自治”疏导作用明显，但处境依旧尴尬。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在郑州多达数十个的街道办中，还“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摊贩自治”之路能走多远，未来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对于“摊贩自治”能走多远，一些社会人士、法律专家和群众认为，在没有更好的治理模式创新之前，首先要坚定改革的决心，部门有决策推广的勇气；其次，具体规定还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

(据新华社电 本报有删节)

光有资金难以振兴游戏产业

■本报记者 赵昂

这几天，买了顺荣三七股票的股民，可谓收获不少。该公司复牌后发布公告称，拟斥资8500万元参与联合收购日本知名的游

戏公司SNK Playmore Corporation，随后其

股票一路飙升，一度涨停。

对于80后一代股民来说，可能记不住

SNK这三个字母，但或多或少都玩过其经

典游戏，例如《拳皇》、《饿狼传说》、《合金弹头》等。当然，自2001年破产重组后，SNK

早已辉煌不再。

顺荣三七拟参与联合收购日本游戏公

司，只是内资资本大举进军游戏市场的案

例之一。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数

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

605.1亿元，同比增长21.9%。随着游戏产

业限制被逐步解除，相关政策日趋完善，加之资本市场对游戏产业潜在价值逐

渐认同，中国游戏市场，已经成为各方资本

逐鹿之地。

去年，中国游戏产业进入“千亿时代”，

营业收入超过1100亿元，为同期电影票房的三倍之多。

越来越多的资金注入游戏产业，很多游戏公司，特别是创业期的小公司，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它同规模的文化企业。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游戏产业细分市

场，不差钱的游戏产业背后却缺少游戏最需

要的元素——原创创意。去年五大游戏细

分市场中，客户端游戏市场销售收入267.1亿

元人民币，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209.3亿

元人民币，网页游戏市场销售收入102.8亿元，社

交游戏市场销售收入25.6亿元人民币。

单机游戏的销售收入是多少呢？3000

万元。

对于一个有5.17亿游戏玩家，其中核

心玩家1.47亿的泱泱大国而言，只有区区

3000万元的单机游戏总销售收入，令人咋舌。

诚然，面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竞争，

单机游戏无论在欧美市场还是日韩市场，其

竞争力都在减弱。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两

大市场，一款单机游戏的销售额，往往就能远

超国内一年的单机游戏总销售收入。

国内单机游戏市场几近“全军覆没”，真正的原因为在于缺乏版权保护，盗版肆虐。往往游戏刚上市，各类型破解版在网上便可轻易下载。盗版带来的“免费午餐”，让玩家们享受一时快乐，却令游戏厂商不敷出，纷纷退出单机游戏研发和销售市场，而开发人员也随之流失。

在游戏产业里，基于PC端的单机游戏，是游戏创意的“水源地”。很多知名的网络游戏和移动游戏，其载体和游戏模式，往往源自于类似的单机游戏。例如暴雪公司旗下知名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是在即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大热之后推出的，风靡至今。

单机游戏销售低迷，原创力量丧失殆尽，使得网络游戏和移动游戏缺少本土的题材来源。国内游戏市场“蛋糕”虽大，但本土游戏公司，要么沦为海外游戏厂商的国内代理商，要么亦步亦趋模仿欧美或日韩游戏，丢掉了本土风格。

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本土风格与原创创

产经周观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改革创新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工作。

《意见》指出，旅游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对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提出